

中國經濟改革——

爭論的原因

顧汝德著
游麗清譯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十二屆第三次全體會議（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決定不僅受到外界廣泛的歡迎，并被視為中國經濟走向合理化和城市工商業邁向現代化的重要里程碑。這決定的重點在於徹底改革計劃體制和價格體系，加強對市場的依賴，壓抑通貨膨脹，確保工資受到控制。（註一）

從中國的內政和經濟脈絡來看，該項決議存在着若干問題。最明顯的問題是：它只不過是一連串國家經濟改革的廣泛原則，缺少了具體改革的詳細藍本和訂定完成改革的時間表。也許有人會說：由於中國目前正嚐試進行黨與國分家，為免黨直接干預到國家的經濟管理，所以三中全會只是發表改革的

基本原則，而三中全會這樣做實在很正確。然而，若仔細分析，這種說法委實沒有根據。

今年中國曾實施一項重要的改革，就是賦予全國八億農民使用土地的權利。這些農村的改革都是經過黨中全會詳細擬定、通過，然後在農村執行的方案。（註二）況且，黨總書記胡耀邦亦不認為自己會受到阻止，不能繼續干預地方經濟發展的問題。一九八四年最令人觸目的事情，就是胡耀邦巡視了七個與經濟發展有關的省份，（註三）這件事顯示胡耀邦在經濟發展方面比趙紫陽總理更為活躍。兼且，今年的撥亂反正政治運動更使胡被視為經濟改革的先鋒，連趙總理也比不上。胡的貢獻包括很多方面，由中國西南的經濟合作及蒙古的石油工業，以至對外貿易和經濟關係。（註四）

雖然如此，胡耀邦在十一月却清楚表示，黨中委會的決定將會留給國家行政當局和企業機構去落實執行。他雖然聲稱中國共產黨有權檢討改革的進展，却没有解釋為何黨寧願站在旁邊監察。（註五）當人大後來接到通知，不要倉猝執行黨中委會的決策時，情況就令人更難以揣摸了。人大委員長彭真會聲稱：「當我說目前不該討論細則問題時，並非表示我們現在不考慮解決問題，而是我們應首先集中精力去研究原則，下一步才討論細則問題。」（註六）

另一點奇怪的是，在三中全會的決定通過之前，某些重要改革經已進行，國家策劃便是最顯著的例子。大約在三中全會召開之前兩星期，國務院便通過了一連串的全面改革措施，但三中全會並沒有提到這些新的規定。（註七）同樣，國家經濟委員會亦於三中全會舉行之前，在十月宣佈了它的經濟改革計劃。（註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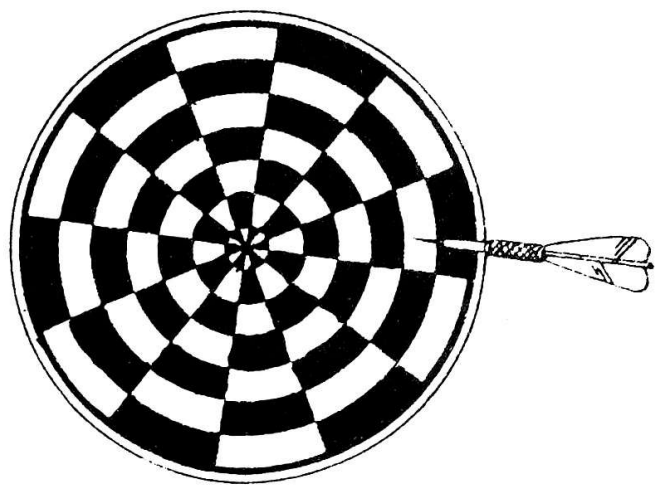
這意味着某些改革所引起的阻力不大，反對已經克服；但有些問題，則爭論依然嚴重，而黨中委會的決定本身亦支持不同觀點的存在，因為它極力主張：「不可稱某些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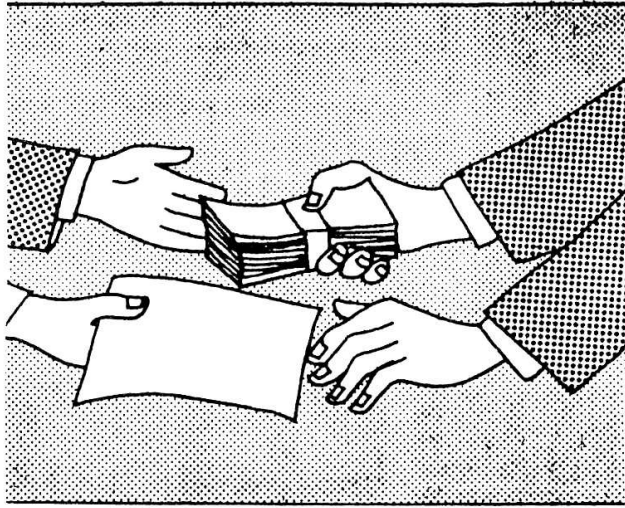
為『改革派』，而另一些人為『保守派』，這樣做會導致幹部與民衆分裂。」胡耀邦在大會結束前表示，三中全會的決定將會面臨頗大的阻力，他提醒說：

這次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會不會有新的阻力？如果有的話，很可能首先來自中央部門和省區、地方有關領導機關，特別是經濟工作部門的一些同志。（註九）

其實，最引起爭論的是價格體系改革的問題，也是最富政治性冒險而又必須掌握的問題。中國一方面要想盡辦法，刺激農業生產，作為消除貧窮的第一步；然後加速改善國民生活水平；以及確保正在迅速擴展的輕工業獲得充足的來源供應。自一九七八年以來，農產品的價格不斷提高，刺激起農作物的產量亦相應增加，致使農村的個人和家庭收入也隨之增加，但這種增加的情況，對政府的財政來說，則剛剛相反。正如財政部長王丙乾在今年五月第六屆全國人大會議上報告，一九八三年的財政赤字，比預算所列的赤字三十億元增加十三億四千六百萬元。赤字擴大的主要原因是：一九八三年農業獲得大豐收，國家多收購農產品，因而相應地多支付超購加價款三十四億七千萬元。（註十）換言之，假如當年豐收的話，現行的農業資助制度會成為影響國家財政預算的一個重要因素，（註十一）而一九八四年的農業豐收，估計會超過往年的水平。

但另一方面，國家又努力防止農作物的上漲價格會影響到城市的生活水平，而政府亦答允肩負起安定城市民生的責任，主要是在食物、房屋、暖氣等民生所需方面，提供大量資助。可是，這些資助費用龐大，並且





繼續增加。一位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曾指出：在一九七八年，國家資助費用為一百六十億元，相等於國家稅項收入的百分之十四，之後，資助陸續增加，平均每年增幅達百分之二十八，到了一九八二年，總數更高達四百三十億，佔全年國家稅項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八。這位經濟學家亦指出，這該是一個幾乎無法忍受的重担。雖然近年國家經濟已全面發展，但目前的落後經濟情況尚未獲得重大改善。他認為國家近年來的經濟發展，仍未足以提供這筆龐大的資助金額。（註十二）

那麼，何不立刻採取徹底的價格改革，以消除這筆提供給生產者或消費者的不必要的資助開支呢？政府在一九八四年間曾檢討過這個問題，但這位經濟學家所指出的最重要一點却是：一九七九年實施在農業方面的價格改革所取得的成效，遠比經常所報稱的全面成功為低。譬如棉花，就由於錯誤估價而過量生產，而稻米的產量却不尋常地下降，與小麥無法成正比。從政治及社會的觀點來看，文章中較令人信服的一點，就是：任

何價格的上升，都會嚴重打擊社會上低收入的人士，加上這類人又愈來愈多，尤其是年紀較大者，他們對通貨膨脹根本毫無還架之力。（註十三）

根據這位經濟學家的見聞，不難歸納出三中全會和整個中國領導層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如果不調整價格，不減少資助，經濟預算將繼續面對嚴重的赤字。理論上，可以強制規定農民接受較低的價格，但是，如果他們的實際收入降低了，他們還會像往年一樣努力維持較高的生產嗎？又從理論上，可以要求城市人口以接近成本的價格去支付食物和暖氣的供應（包括房屋建造和保養），但是，為了城市中最脆弱的一群而拖低整個社會的生活水平，社會能忍受這點做法嗎？中國會不顧通貨膨脹而任由價格和工資上升嗎？而中國，以她一向對通貨膨脹的敵視態度，肯冒這個險嗎？三中全會的決議決心要對付這些由通貨膨脹所引起的物價和工資上升。

於是，三中全會在改善生產方面去尋求解決之道，其觀點就在於：市場與價格是生產者的行動指標。如果一種原料的來價貴了，則有效率的工廠就會減少運用這種原料，轉用較廉宜的同類物品代替，或以更有效率的方式使用這些較昂貴的原料。因此，只要能運用管理去改善工廠的效率，則原料價格的提高亦不會導致該供應品生產成本的提高。同樣，假如一種商品在市場的售價上升，生產者便該增加生產；而同時，購買者或消費者亦該理性地減少對較昂貴產品的需求量。市場與價格的合理調整，實有賴於生產者和消費者的供求，這是三中全會決議所特別強調的一點。

可是，實際的爭論就出自這一強調點上

。三中全會的決定指出，「各項經濟體制的改革，包括計劃體制和工資制度的改革，它們的成效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價格體系的改革。」如不改革價格，則無法獎勵有效率的人，也無法刺激個別農民和工人改善其操作。不幸，整個經濟却建立在一個不合理的價格體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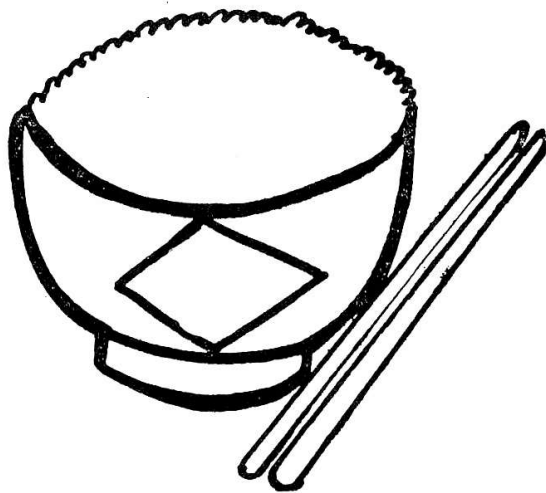
零碎的改革只會帶來消極的效果（如農業方面的經驗所顯示的）。賺錢最多的工廠未必有最高效率。在過去，只要一間企業的生產是國家最需要，這間企業便可享有許多優惠，獲得廠房和設備的資助，擁有廉價勞力和原料、良好的運輸便利。到如今，即使電能和其他購入原料都漲價，却絲毫沒有影響到這些企業在過去所獲得的優惠，因為它已建立起它的生產設備，擁有它的工本和經濟儲備。

這種情況到一九八五年將會更加嚴重，因為到時很多新工業計劃將由銀行借貸去支持，屆時除了確保到期有錢還給銀行外，還要支付利息。迄今為止，這類投資資金全由國家預算自由分配，因此，價格調整將不能改正舊有措施所造成的不合理，尤其是當它成爲了一間企業的基本體制和資源時，更屬不可能。（註十四）

第二點要考慮的是，價格調整可能產生一些管理人員實際無法克服的困難。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把煤的價格與石油相比較。中國的煤價和油價，比國際自由市場的價格大幅度偏低。（註十五）中國的能源短缺，而國家更呼籲盡量節省燃料，但當燃料（比如煤）在國內以虧損的價格出售時，人們根本就不會去節省（除非勸導他們）。當燃料的價格比世界市場還平易時，中國的消費者就等於受到鼓勵，會比他們的外國朋友更浪費石

油和煤。但，當一間工廠或一個發熱體系以低價燃料建立起來後，則一旦燃料價格提高，便需要重新注入更大量的資金。

簡言之，主要的原料一旦漲價，便需要改用較昂貴的新機器，以切合新的成本結構比例。當然，這番道理亦同樣可以應用在勞力的市場情況上。中國工人深受政府的資助，所以勞動力廉宜。假如政府撤消資助，改由企業根據市場情況去支付合理工資的話，這樣，這些需要僱用大量勞工的機構，若要賺取賺取盈利，便需搞盡腦汁了。



最後一點要考慮的是，中國經濟管理當局是否真的願意接受三中全會的決策，接受價格改革所帶來的競爭呢？其實，小型鄉村企業自一九七八年後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就已經答覆了這個問題。整體上，政府寧願保障現有大型企業，使之不受小型生產者的影響，而在煙草、絲綢、成衣、機械工具等不同工業中，亦聽到正式的投訴，而投訴內容主要指責鄉村企業比城市企業更易取得原料供應，以及鄉村企業的產品售價又比他們

的城市對手為低，因此要想辦法限制這些鄉村企業的自由。（註十七）當一間城市工廠投入生產時，政府或地方管理當局都會盡力維護這間工廠，使之好好運作，要求它歸本，亦要從它的生產成果中獲得稅項收益和其他利潤，又需要它為國民提供就業機會。

即使簡單探究一下影响中國管理者的投資及生產決定的經濟及技術因素，便可看出價格的變動是極端複雜的。從政治眼光來衡量，這些複雜因素并非特別容易應付。在一個不奉行馬克思—列寧—毛澤東思想的國家

中，補救之道會是用自由市場去代替計劃體制和價格控制，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很多西方國家便是這樣去重建他們的經濟。三中全會的決定堅持以策劃經濟去「避免資本主義社會的放縱生產和惡性循環」，却沒有指出共產黨中央策劃如何能與自由競爭的市場原理結合起來。這個左右為難的問題必會在中國引起爭論，就像經歷了半個世紀的工業經濟爭論一樣。（附註參閱本刊頁六三。）

